直摅血性为文章:如何读书为文?

■牟钟鉴

板桥的诗作,我最喜欢的是《偶然作》。起手就是:“英雄何必读书史,直摅血性为文章”,气慨非凡。

“英雄”者志于道者也。“摅”者抒也。“血性”者刚强正直之气质而热血周身流淌也。该诗接着云:“不仙不佛不贤圣,笔墨之外有主张。纵横议论析时事,如医疗疾进药方。”他进而诠释了“英雄”的含义,英雄不是个人成仙成佛成贤圣,而是能为社会各种弊端提供有效的治疗药方,为大众解除疾苦。接着,他评击了各种读书为文偏向。一种是:“名士之文深莽苍,胸罗万卷杂霸王,用之未必得实效,崇论闳议多慨慷。”这些名士博学识广,下笔万言,出口成章,纵横千古,但不切实用,流于空谈。一种是:“雕镌鱼鸟逐光景,风情亦足喜且狂。”这些文人把功夫都用在细小光景的描绘上,不关国计民生,却自得其乐。一种是:“小儒之文何所长,抄经摘史饾饤强;玩其词华颇赫烁,寻其意味无毫芒。”这是一些寻章摘句的经师,看起来满腹经纶,却不能传道授业解惑,又不敢触动社会病态,板桥在这里把评击的矛头指向了雍乾年间兴起的考据学,它偏离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该诗接着云:“弟颂其师客谈说,居然拔帜登词场。初惊既鄙久萧索,身存气盛名先亡。辇碑刻石临大道,过者不读倚坏墙。”这些经师讲究门户,同派友人弟子颂扬其学,遂在文坛上树起学派名声。他们虽然盛兴于一时,不久便被人们忘却。于是运碑刻石立于大道之旁,以便留名后世,永垂青史。可惜路人对碑文毫无兴趣,只不过倚在碑墙上歇息而已。

这使我想起昆明大观楼孙髯所撰长联下联中有云:“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这些碑都树在外境,而没有树在人们心里,所以不能持久。该诗结尾云:“呜呼!文章自古通造化,息心下意勿躁忙。”这最后两句与开头两句相对应,最为精彩。“造化”者天地化育万物、天地人相生之道也。文章通造化是要求赞天地之化育而涵养生命之成长,因而能感人感物,为此必须“息心下意”,不能急功近利。纵观全诗的意味,板桥不是反对人们读书史,而是要人们从中领略生命的意义,具有“民胞物与”的情怀,并抒发为文,使社会人生得到提升。不无病呻吟,不作书虫,不空谈虚浮,不在自我小圈子中打转。人要有血性,心要有温度,才算一个真正的人,不能麻木不仁、碌碌无为。我们夸赞“热血青年”,指的是有作为、爱大众、敢担当的青年。

板桥在多处讲过“文以载道”的意思。如《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告诫其弟,不要学市井流俗不堪之子玩弄文笔,“吾弟欲从事于此,可以终岁不作,不可以一字苟吟。慎题目所以端人品,厉风教也。”要求十分严格。《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说:“文章以沉着痛快为最,《左》《史》《庄》《骚》、杜诗、韩文是也”,“东坡居士刻刻以天地万物为心”,他批评“若王摩诘、赵子昂辈,不过唐、宋间两画师耳!试看其平生诗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间痛痒?”其《自叙》说:“板桥诗文,自出己意,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切于日用”。他在《与江昱、江恂书》里,推崇《五经》《左》《史》《庄》《骚》以及韩、柳、李、杜等,认为他们“理明词畅,以达天地万物之情,国家得失兴废之故”。可知板桥坚守直摅血性为文章和文章要通天地造化、切民生实用的原则。

在读书方面,他是“求精不求多,非不多也,唯精乃能运多,徒多徒烂耳”(《板桥后序》)。他在《集唐诗序》中谈他读唐诗的感受:“集唐诗则必读唐诗,而且多读唐诗。自李、杜、王、孟、高、岑而外,极幽极冷之诗,一旦火热,使得翻阅于明窗净几之间,此亦天地间一大快事也。读唐诗,则必钻其穴,剖其精,抉其髓,而后能集之。使我之心,即入乎唐人之心,而又使唐人之心,即为我之心。常觉千古名流高士,俨聚一堂,此又天地间一大快事也。”“夫唐人之诗,旧诗也,读之千古长新,得君之集而更新,满纸皆陆离斑驳。”板桥上述所言,乃读书之旨要:一是求精不求滥,二是要沟通彼此心灵、心心相印,三是常读常新。唯其如此,才能把古典佳作读懂而活用之,滋养自己的性情,再抒发出新的能打动人的诗文。板桥如此强调是有针对性的。当时学子在发达的考据学影响下和僵化的科举制度引导下,形成埋头经典、死读书的风气,崇尚过目成诵,而不求甚解,更不能明体而达用,故板桥大声疾呼,读书要精,要活学活用。他在《四书手读序》中说:“板桥生平最不喜人过目不忘,而四书五经自家又未尝时刻而稍忘。无他,当忘者不容不忘;不当忘者不容不忘耳。”他好骂秀才,“秀才受病,只是推廓不开”(《淮安舟中寄舍弟墨》),所谓“推廓不开”就是指读书不能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只积存了一堆无用的知识。

我们如果用板桥提出的“直摅血性为文章”和“自出己意,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切于日用”的要求来衡量一下板桥自己的诗文,就会看到他是做到了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的。他的诗文没有满篇引经据典,没有空泛之论,没有词藻堆砌,没有清谈风月;有的是忧国忧民,忠厚传家,挺立人格,护养万物,创新求变,因此情深意切,具有感人的魅力。就其诗词而言,大量的是忧虑民间的疾苦,替民众控诉社会的不公,如《悍吏》《私刑恶》《孤儿行》《逃荒行》《还家行》《后孤儿行》《思归行》《姑恶》《潍县竹枝词》《贫士》《破衲》《田家四时苦乐歌》《道情十首》等,都贴近下层民众生活,绘出一幅幅人间悲剧和困苦的图画。其中《悍吏》《私刑恶》《逃荒行》所描写的民众苦难,使人不忍卒读。就其家书而言,主要的内容是讲忠厚传家,切望其弟尊重农夫,仁惠乡邻,惜贫济穷,学会吃亏,并为自己解官归田预作打算。他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中规划将来结庐在乡,“或曰:此等宅居甚宜,只是怕盗贼。不知盗贼亦穷民耳,开门延入,商量分惠,有甚么便拿什么去,若一无所有,便王献之青毡,亦可携取质百钱救急也。”其恻隐之心实在难能可贵。就其题画诗文而言,是用题词点明所绘兰、竹、石的画外之意。如在《画兰竹石》中说:“其劲如竹,其清如兰,其坚如石”,“兰有幽芳,竹有劲节,德相似也;竹历寒暑而不凋,兰发四时而有蕊,寿相似也”,“板桥画竹,不特为竹写神,亦为竹写生。瘦劲孤高,是其神也;豪迈凌云,是其生也;依于石而不囿于石,是其节也;落于色相而不滞于梗概,是其品也”。

板桥读书为文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今天的人们“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即可也。在自然科学上,我们要“直依理性为文章。”在人文学科方面,我们仍然需要“直摅血性为文章”。我们不必模仿板桥,但仍应在文章中融入自己人生的真实体验,方有感人的效果,切不可把人文变成纯知识加以贩卖,那就有违“人文化成”的宗旨了。

纯粹而久远

■凸 凹

阅读的方式决定着阅读的深度,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自媒体的阅读,带来了信息获取的快捷与广度,但碎片式的阅读,也让人浮躁,阅读的程度不过是停留在浅尝辄止。而传统的阅读,也就是纸媒体的阅读,会让人在纸面上停留,容得下思考,因而就沉潜,能读得出字面之外的意义。特别是有难度的阅读,不仅要停留,还要进入、玩味,穷究内里,整个过程是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动作,在抽象处顿悟。久而久之,阅读能力便在无形中提升,再艰涩、枯燥和深奥的文字也能读得下,也能读得明白晓畅,即便是读哲学的著作,也像读小说。

由于执着于纸面的阅读,特别是钟情于名著和经典的阅读,我养成了“深阅读”的习惯,每一阅读都要静心,都要备以纸笔,勾画、摘句、点评、眉批,朝“通透”里阅读。四十岁以后,我就基本上不读抒情和叙事类文字了(散文和小说),偏重于读诗和哲学,怕自己读得懒和滑,不能思在深处、高处、远处和“别处”。所谓“别处”,是苏珊·桑塔格的说法,大概是指超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之外的有关人类精神极限和普世价值的思考,即纯粹的“思想之美”。到了现在,我读哲学读得比读小说还畅快、还津津有味,作用到生理上,每读哲学,心神就清明,就不知困倦,夜深天暗,也像在白日里游赏。也不敏于四季,冬天读去不忌惮冷,酷夏读来,也不觉得热,屋里的空调被闲置了。

这个周日,午休在床,不仅不能入睡,即便是躺也不能躺得安稳,烦躁之下,向书架上张目。不期就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一版),它那赭红的封面让人想到大地的颜色,心中袭进一丝暖意,便霍然起身,抻而读之。

起初是仰在床头浏览,翻着翻着就有了兴味,不禁起身坐于床尾,最后竟移至书案,做庄重的阅读。吸引我的,是一篇恩格斯的论述,题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文论的篇幅凡44页,三四万字的样子,却一气读完,不曾有片刻停歇。因凝神静气、全神贯注,饱享智慧之美,疑似天赐大福。

恩格斯的这篇长文,是读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之后,就哲学的起源、本质、地位、作用以及分类、发育所做的系统阐述。甫一开篇,就用形象的语言告诉人们,法国和德国虽然都是“哲学的故乡”,哲学革命都做了政治变革的前导,但其存在状况,却有大不同:“法国人同一切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要拿到国外去,拿到荷兰或英国去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着进巴士底狱。反之,德国人是一些教授,是一些国家任命的青年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包括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为什么法国的哲学多具有反体制的特征,并且激情大于理性,殊少完整的体系,也常用“宣言”的形式向外输出革命,而哲学家本人的行动人格却显得异常贫弱,譬如卢梭。而在德国,即便是马克思这样的“革命导师”,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却也能安坐于自己的书斋之中,也能自由出入皇家图书馆,从容不迫地构筑《资本论》那样的庞大的哲学体系,盖因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具有哲学传统,在时间深处,积累了厚重的历史理性,见容于思想的自由。

恩格斯接着说,“全部的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狭隘而愚昧的观念。”这又是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说法,原来正是“时代的狭隘”和“愚昧的观念”催生了哲学。沿着这个思路,我们不难想到,从笛卡尔到黑格尔,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在这一个长期的过程中,推动哲学家前进的,绝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的思想的力量,真正推动的力量,是自然科学的发达、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也就是说,那种用泛神论的观点来强调精神和物质的对立,过于相信思想本身的力量,而忽视了客观世界对哲学的作用——而且是主要的作用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其把哲学神秘化的倾向,会让哲学脱离人们的生活实际和社会状况,无从致用,沦为玄学。

恩格斯正是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上,开始了他对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中一系列形而上学观点的理性驳诘。他认为,宗教并不是对上帝旨意的传递,也不是按照上帝的指引所进行的道德救赎,其本质,不过是在教义基础上所建立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心灵关系而已。因而宗教情感,也绝非是一种无差异的普遍遵从、信奉,而消泯自我体认的“绝对情感”,它也是有着毋庸置疑的物质属性、现实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在这一点上,恩格斯则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论辩手法,让费尔巴哈自证其谬。因为费尔巴哈自己也承认:“宫廷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人所想的是不同的”,“如果你因饥饿、贫困而身体里没有营养物,那么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可用的食物了。”由此看来,虽然我们不能再用阶级斗争的学说衡人论事了,但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精神的基本观点,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哪个社会阶层、也无论哪个哲学流派,都无法否定的。宗教在不同的人群之中,有着不同的现实具象——帝王拜位,商人拜金,士人拜名,农民拜土地……

基于此,便不能人为地夸大宗教对人的作用。我们考虑问题时,不能仅仅把人作为一个“纯粹的自然物”,而且要看到人是生物、文化和社会的综合产物。虽然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来就有的,这也构成了一切道德产生的基础,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受到内在和外在的双重矫正——第一,受到人类行为的自然后果的矫正:酒醉之后,必定头疼;放荡成习,必生疾病。第二,受到人类行为的社会后果的矫正:要是我们不尊重他人追求幸福的同样的欲望,那么他人就会反抗;如果我们的自我实现,与社会的现行规则相违背,就会受到法律制度的惩处。所以,要满足和实现自己的欲望,首先要正确地估量我们行为的种种后果,也就是说,我们不能随心所欲,要学会自我节制,要懂得爱人,这或许就是宗教得以存在的基本准则。否则,再神圣的宗教,也会沦为精神鸦片,既麻痹自己,也欺哄他人。

恩格斯的论述,处处闪耀着唯物主义的理性光辉,入情入理,醍醐灌顶,观照当下,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是一副特别的清凉剂,既可以纳凉,也可以醒心,疗治昏蒙与愚昧。

这不免让人想到,眼下,一提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人们马上与意识形态发生联系,产生本能的逆反,这是过度政治化的过枉矫正,是历史造成的理论偏见。而事实上,一旦潜心进入文本,譬如恩格斯的这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们立刻就发现,其论述,无不贴着人、人与人、人与社会这些基本的哲学命题有理有据地展开议论,都是在“常识”层面说话,都是唯物的、人本的观点,具有“纯粹的哲学”之美。文字之中,不仅有渊博的自然知识、丰富的历史信息、勃郁的理性逻辑,还有着醉人的智性之象和耀人的灵魂之光,让你不得不沉浸其中,真心信服!

正如恩格斯预言德国古典哲学将要终结而没有终结一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的马克思、恩格斯,其哲学使命也不会终结。因为他们不仅“宣言”,而且还“学问”,他们“纯粹的”、巨大的思想存在,自身就有拨云见日、关怀后世的精神力量,不只属于特定的党派团体,也属于每一个普通的读者。

如何面对三只不同的苹果

■陈歆耕

习总书记在两次重要讲话中,都强调要加强文艺批评,乃至明确地提出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但我知道实际操作起来会遇到重重困难。纯粹的文艺批评具有足够的空间,那么障碍来自哪里呢?简单地说,可能与批评者、被批评者利益纠葛有关、与人情面子有关、与如何理解总书记讲话的深度有关。批评界貌似的“安定团结”,导致的结果也许是令人窒息的沉闷、原创活力的衰弱。但作家出版社迎难而上,真抓实干,推出一套《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这让我非常钦敬出版社的胆识。说这一事件,要载入当代文学批评史,大概不算是过誉之词。这套丛书集中了中国当代文坛一批“敢言之士”的文字,这里有学院派的博导,也有打工评论家;既有专业的研究人员,也有创作与评论兼容的作家型批评家;有体制内的,也有体制外的……英雄不问出身,“不拘一格降人才”,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一股清新的锐气,一股蓬勃向上的力量,将会让文坛内外人士,对当下文艺批评的生态有新的认知。

敢于“亮剑”,将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化为引领批评的成果,值得称道,也必将成为中国批评界的一件大事。如果今后有谁说,中国当代批评家只会胡吹乱捧;我就会说,请你去看看作家出版社的那套《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

由此,我也产生了一点个人感慨。批评家在剜烂苹果时,常常会碰到不同的苹果。这里说的通常是那些局部有些“烂”,剜一剜后还可以吃的苹果,对这样的苹果我们采取鲁迅所说的“好处说好,差处说差”的态度就可以了。有肯定,有否定。但还有些苹果,不是局部“烂”,而是整个就是一只“烂苹果”,尤其是出自名家的“烂苹果”,我们有无勇气地说,那个苹果已经烂透了,无法去“剜”,就索性把它扔掉吧!还有一种苹果,在生活中是大量的,那就是整个是完好的,吃前削削皮就可以了。但在文艺创作中,如这般完好的“苹果”是极其罕见的,在我看来,只有那些能够经得起数百年乃至几千年时光检验,被读者公认为具有永恒价值的经典,才有资格被称之为是相对完美的苹果。因此批评家需要特别谨慎,勿轻易地将一只刚落地的苹果供奉到神龛中去,更勿轻易地判定为又一部《红楼梦》问世,预言其将流芳百世。有太多的预言,最终都成了贻笑大方的“谎言”。当然更不能把一只烂透的苹果,说成是一只完美的苹果。导致批评家公信力彻底丧失的,最常见的是后一种状况。即使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也是经历了长时间的争议、研究、阅读,才最终站稳了无法撼动的经典地位的。

我还希望这套丛书的推出,仅仅是强化“锐批评”的一个起点。进入这套丛书的只有10位作者,就是这10位作者,也有很“锐”,也有不那么“锐”的,相对于偌大的中国文坛,显然还是有些势单力薄。因此需要倡导、挖掘、扶持更多的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艺术感觉、敢道真言的作者进入这个序列。让“锐”批评家的阵容,更为壮大,“锐”批评的氛围更浓。

不过要营造更为阔大的批评气象,我也并不认为完全要依赖外力的推动。说到底,还是与批评家自身的胆识和批评激情有关。因此我觉得批评家或准备以批评为业者也需要自省自励:您是否有当“将军”的追求,有成为当代“别林斯基”的野心?您在批评他人时,是否也有接受他人批评的雅量?您在选择批评靶标时,是完全出于批评家的良知和审美趣味,还是有利益的考量?您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还有只有一分证据,却说三分乃至五分的话?因此,剜烂苹果者,也要敢于正视自身的“疮疤”,不断地完善自己。这样在拿起手术刀“剜烂苹果”时,就会气势如虹,刀光更闪亮,刀法更娴熟,指向更精准。

为什么要关注儿童戏剧

■谭旭东

对儿童戏剧的兴趣,说起来话长了。

十多年前,在北师大读研究生时,我就参与了一本教材的编写,其中的儿童诗、儿童戏剧两部分就是我写的。编写儿童戏剧这一章节时,读了不少戏剧资料,也了解到不少第一手的儿童戏剧材料,当时很想写一本关于民国儿童戏剧的小书,但种种原因,尤其是有了女儿,精力顾不过来,且很难找到出版社出版。

后来,又跟着艺术学院的老师参与了一本师范生的影视艺术教材的编写,我写的是儿童影视这一块内容。通过对艺术类教材的阅读,也多少了解一些影视与戏剧教育的专业知识,对戏剧这一学科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让我又添了对儿童戏剧和影视的理解。

另外,在做儿童文学研究时,发现很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都为孩子写过戏剧,如张天翼、包蕾和孙毅,都专心写过童话剧。如,张天翼1954年时就出版过童话剧《大灰狼》。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们》一书,除了收录了他写的儿童小说,也收集了他写的儿童剧。包蕾是民国时期就很有名的童话作家和儿童剧作家,1940年他写了儿童多幕剧《雪夜梦》,后来曾先后写作成人电影文学剧本《三人行》等、儿童剧剧本《胡子和驼子》《巨人的花园》《瓶里的魔鬼》等。他的代表性的儿童戏剧作品收入了《包蕾童话剧作选》。还有年过90岁的孙毅老先生,他年轻时就追随宋庆龄,在上海中国福利会从事儿童剧创作与指导,一边编《儿童时代》杂志和主持上海木偶剧团工作,一边为孩子写儿童戏剧。从1949年上海解放到1986年孙毅老先生离休的37年里,他一共出版了13本儿童戏剧和儿童相声,约100多万字。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鉴于各种60年儿童文学分类选本时都涉及儿童戏剧文学,孙毅先生“怀着深重的责任感和忧虑感”,以一己之力编辑、出版了《新中国60年儿童戏剧短剧选》。

从儿童戏剧发生史来看,很多儿童戏剧名家,本身也是儿童文学作家。如中国现代流行音乐之父,也是中国现代儿童戏剧的开创者之一的黎锦晖,他不但创作了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还创办主编了儿童读物《小弟弟》《小妹妹》和《新少年》等,也是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之一。还有任德耀先生,也是儿童戏剧家兼作家。此外,那些比较受孩子欢迎的儿童戏剧,大部分都有一个好的儿童故事,或者一个好的童话。也就是说,儿童戏剧与儿童文学是良性互动的,甚至可以说,优秀的儿童文学是儿童戏剧的资源和底子。遗憾的是,现在不少儿童戏剧和儿童戏剧教育却脱离了儿童文学,完全变成了商业行为。

随着对儿童戏剧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加上自己也喜欢改编和创作一些童话剧,于是,我开始梳理一些史料做专题研究。《当代儿童戏剧发展史论》就是我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当代儿童戏剧发展轨迹与现实问题研究》的成果。

在做这个项目时,我得到了“80后”儿童文学作家陈曦的大力支持,他是天津师范大学的高材生,也是一位儿童文学新秀,出了儿童诗、儿童散文、童话和科幻集,本身也是戏迷和票友,对儿童戏剧不陌生,是一位非常勤奋有悟性的研究生。他帮助我查阅和收集了大量的儿童戏剧资料,还与我合写了《当代儿童戏剧史论》这本书,也保证了这本书的内容丰富又鲜活。

中国儿童戏剧已经有百年历史,这本书只是对当代的60余年的发展做一个比较粗略的描述和梳理,以后有机会,我们会写一本比较精细的百年中国儿童戏剧史论,那样,就更有意思,更有价值了。

回顾自己对儿童戏剧的关注和一点研究,庆幸,我和陈曦一道摘获了一枚甜甜的红果!